

百岁杨苡的翻译人生

本报记者刘梦妮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游戏，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后你尝到它的甜味。”刚刚过完103岁生日的杨苡，将翻译称为“游戏”，这足见她的个性，事实上，“这是一种玩法”是她现在的口头禅。

女儿赵蘅有时甚至觉得母亲就像一个小女孩，“并不是她样子有多年轻，而是她仍然思维活跃，活力四射，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好奇”。

杨苡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是著名翻译家，代表译著《呼啸山庄》畅销数十年。在她看来，翻译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游戏，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后你尝到它的甜味”。“这是一种玩法”是她现在的口头禅

女儿赵蘅有时甚至觉得母亲就像一个小女孩，“并不是她样子有多年轻，而是她仍然思维活跃，活力四射，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好奇”

“这本书是妈妈的创意，也是她定的书名。舅舅生前，妈妈与他商量过这件事，她很重视这本与哥哥共同的译著。”赵蘅介绍。

一同出版的还有赵蘅的《我的舅舅杨宪益》，“妈妈和舅舅翻译了很多经典著作。但他们从来不曾觉得自己了不起，用我妈妈的话说，‘我哥总说自己是翻译匠，那我就是练笔吧’。”

如今，杨苡仍生活在南京那套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房子里，屋子里摆着很多老照片，记录着她生命中重要的人和重要的时刻。

刚刚过了103岁生日的杨苡，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是著名翻译家，代表译著《呼啸山庄》畅销数十年。在她看来，翻译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游戏，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后你尝到它的甜味”。“这是一种玩法”是她现在的口头禅

女儿赵蘅有时甚至觉得母亲就像一个小女孩，“并不是她样子有多年轻，而是她仍然思维活跃，活力四射，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好奇”

杨苡与巴金。 赵蘅供图



常跟着哥哥杨宪益去书店

“我的命不好，因为我没有爸爸。”2021年5月，一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九零后》上映，影片开头响起的是百岁杨苡的声音，将她的身世娓娓道来。

赵蘅告诉记者，杨苡出生两个月时，她的父亲就去世了。“我外公是当时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我外婆要强，也重视教育，对自己的三个孩子，她不分男女都要求他们好好读书。”

三个孩子后来都学有所成，杨苡的哥哥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英译了百余种经典名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苡的姐姐杨敏如，毕业于燕京大学，师从顾颉刚，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杨苡小学和中学上的天津中西女校，“在那里，妈妈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中英文基础。”赵蘅介绍。

杨宪益是杨苡一生最崇拜的人。《九零后》纪录片中，百岁杨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最欣赏的当然是我哥哥。”

“哥哥爱护两个妹妹，妹妹佩服哥哥，他们的感情一直特别好。”赵蘅说。

小时候，杨苡总拽着哥哥的衣袖跟来跟去，到书店买书、看电影、逛市场都要跟着，以至于杨宪益的同学开玩笑说杨苡是“小巴儿狗”。

杨苡曾跟赵蘅说起与哥哥一起买书的经历：“妈妈受舅舅的影响很大。小时候她常跟着哥哥去书店，哥哥说这个书好，她就拿着，都听哥哥的。”

而在杨苡的回忆中，哥哥总能满足她各种心愿。杨宪益是家中独子，待遇远在妹妹之上。“我要这要那的，母亲不允许，但跟在我哥后面，就是另一回事了。每逢我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我就拉拉他的衣服，他问一句，想要？我

点点头，他吩咐一句‘要这个’，就解决了。”

1937年，杨苡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南开大学。没想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轰炸让南开大学沦为一堆焦土，师生被迫南迁，杨苡也希望南下继续学业。“在英国留学的舅舅也写信回来，劝外婆允许妈妈离开天津，说妈妈的性格不适合留在沦陷区。”赵蘅说。

于是，杨苡和几个同学一起坐船从天津到香港，再绕道越南，最终抵达昆明。

“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

“妈妈兴趣非常广，她喜欢文学、电影、戏剧，还学过跳舞。”在赵蘅看来，母亲杨苡走上翻译之路，除了杨宪益的影响，还有沈从文与巴金的推动。

杨苡到了昆明后，与同住在青云街的沈从文相识。她本来想上中文系，但沈从文了解她的情况后，劝她进外文系。“他说我妈妈英文底子那么好，不适合去读读读。他很有预见性，是我妈妈人生大方向的指路人。”赵蘅告诉记者。

沈从文常常鼓励杨苡多读书，不要荒废时间。晚年杨苡仍然记得，夜里自己要睡觉了，对面楼上沈从文的房间里还亮着灯。

巴金一直通过书信影响着杨苡。在天津读中学时，杨苡就开始与巴金通信。“我哥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巴金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这样的通信伴随着两人境遇的起伏，持续了一生。

杨苡曾向巴金表示想做《家》中慧慧，巴金不赞成，回信劝她先把书念好。大二那年暑假，杨苡与赵瑞蕻结婚，生下大女儿。之后，她应在重庆避难的母亲要求，到重庆中央大学继续学业。

1942年6月，巴金写信鼓励杨苡：“人不能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1943年底，巴金在信中谈到了翻译：“你有空，我还是劝你好好翻译一本书……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解，去传达原意。”

巴金是直言不讳的。1950年代初，他看了杨苡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俄罗斯性格》后也曾说：“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从那时起，杨苡“下决心让我的译文或译诗必须要为读者着想，要经得起行家对原文推敲”。

英美文学专家陈嘉对杨苡的翻译生涯也有影响。2002年，杨苡在《天真与经验之歌》的译后记中，回忆半个多世纪前在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的日子，陈嘉教授“朗读英诗时那种柔和委婉的音色和铿锵有力的吐字永存在我的记忆里”。她还记得黯淡的灯光下，陈嘉一字一句对照修改她翻译的诗，连押韵和节奏也要推敲。《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中，杨苡所译诗歌很多都是在重庆做学生时完成的。

杨苡第一次接触《呼啸山庄》的故事，是在天津读中学时，她看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魂归离恨天》，就被深深吸引。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借读时，她在图书馆读到《呼啸山庄》的英文原著《Wuthering Heights》，萌发了翻译这本书的念头，还写信告诉了巴金。

听说杨苡打算翻译《呼啸山庄》，巴金很高兴，他回信鼓励杨苡，并提出要帮她出版。“你要译 W.H.《呼啸山庄》英文书名缩写，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

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吧，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

在杨苡之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本书，他的英文很好，却把书名译为《咆哮山庄》。“妈妈对这个书名不以为然。”赵蘅告诉记者。

1954年春，杨苡翻译这本书期间，恰逢丈夫赵瑞蕻被外派到民主德国教书。一天晚上，窗外狂风呼啸，雨点打在窗户上，此情此景，犹如亲临《呼啸山庄》的故事中。“就这样，妈妈的灵感突然来了”，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杨苡确定了“呼啸山庄”这一书名。

巴金也没有忘记10年前的承诺。1956年，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1980年，这本书再次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的40多年里，这一译本多次再版，至今仍然畅销。

“等待与希望”

在南京定居的杨苡，晚年总惦记着要去北京看哥哥。“妈妈一般年来北京，因为舅舅的生日是在冬天，她要陪舅舅过生日。”

赵蘅还记得，2009年春天，杨苡离开北京前在杨宪益家聚会的情景，“我妈妈还像小妹妹一样倚着舅舅，有一种撒娇的感觉。分别时，舅舅笑着，妈妈已经哽咽了。”

这是杨宪益和杨苡最后一次见面，半年后杨宪益去世。哥哥不在了，杨苡再也没有去过北京。

今年8月之前，杨苡生活仍都基本自理。“她自己洗漱，保姆只是在旁边看着避免她摔跤。她在家都是借助助步器自己走。8月时，妈妈生了一场病，最近渐渐恢复走路，精神也越来越好。”赵蘅介绍，杨苡喜欢靠在床

头看报看书，还是电影电视剧的热心观众，“有喜欢的电影，她还会让保姆打电话叫我看，常常我在北京，妈妈在南京，我们看同一部电影”。

“她还有微信呢，虽然不会发消息，但天天都要看朋友圈。”赵蘅笑着说。

杨苡家中充满怀旧、艺术和童真的气息。沙发靠背上和柜子里摆着可爱的玩偶，大多是亲朋好友送的，还有一个玻璃柜专门放各种各样的猫头鹰，有布的，有瓷的，有金属的，“妈妈视猫头鹰为智者。”赵蘅告诉记者。

对于布置房间，杨苡至今都兴致勃勃。最近她刚出院，身体还在恢复中，便又想要挪动家具。“我很佩服妈妈，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情趣。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活在美中间。”赵蘅说。

杨苡一直记得1997年最后一次见到巴金时的情景，那时巴金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他坐在轮椅上，仍使劲对杨苡说：“多写，多……写！”1998年，杨苡与人合译完成《我赤裸裸地来——罗丹的故事》后就停止了翻译，但这些年来，写作一直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到现在，妈妈都喜欢给自己列创作计划，大量的文章题目，基本上是怀旧，虽然她已经很难完成了。”赵蘅说。

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杨苡一如既往地认真，用她的话就是文章写出来要“摆一摆”，放上几天，再反复修改好几遍，直到满意为止。她偶尔还会写打油诗，或者写字条让保姆拍下发给赵蘅，“妈妈日常交流也喜欢用文字表达”。《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出版后，她在给赵蘅的字条上这样写道：“书印得好，我相当满意，感动得眼眶发湿。”

“妈妈很喜欢念稿子给我听，念完会问，‘这样写行吗？’那样子的非常可爱。”赵蘅说，她总觉得母亲身上有一种时间凝固了的感觉。

1937年冬天，18岁的杨苡在读完《基督山伯爵》的英译本后，非常喜欢故事的结局，“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待和希望”。当时，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者炸毁，她只能待在家中。在给同样身处沦陷区的巴金的信中，她写道：“我记得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书里的末一句话：Wait and hope，我愿意如此。”巴金在公开发表的《感想》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说“这 wait 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

60多年后，1980年底，听说巴金腿受伤后，41岁的杨苡在给巴金的贺年片中又写上“Wait and hope”。巴金回信中聊到了1937年的那封信，又说，“我相信我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又是40多年过去，“等待和希望”仍是杨苡最爱的句子，不断出现在她的题词、文章和采访中。

参考资料：
《杨苡百年回忆录》，杨苡口述，余斌整理，名人传记月刊
《雪泥集》，巴金著，杨苡编注，三联书店《青春记忆》，杨苡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接9版）时人曾以“谪练边情，勤奋耐苦”评价踏查长白山、为天池十六峰命名的刘建封，张福有也用这8个字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前贤这个境界，我们的条件是前人没法比的，不能辜负历史给我们的机遇。”

历史是从前的现实，未来是今天的果实。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忧责，我们是前贤的陌生人，握住上辈人的手，做这代人的事，等待未来的某些时刻，属于我们的陌生人也会拉住我们的手。“力不会白出。垂头丧气的时候，只要想想这些，我就又充满了希望。”张福有轻轻地笑了。

“活儿没干完”

“累，怎么不累啊？谁累谁知道。”私底下，周围人眼中不知疲倦为何物的张福有承认。有一回，他独自出门考察回来，进门先让老伴拍下自己背着60多斤行李、风尘仆仆的样子。“拍下狼狈相，若干年后，走不动、背不动的时候，自己拿出来看看。孩子们如果感兴趣，也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没有付出哪有收获？老爸是这样艰苦奋斗过来的。”

还有一回，他写下重走古道途中的慨叹：“真是累得受不了，一步也不想迈了……花白的头发，一个地道的白头翁，不累才怪呢！服了吧！”可转身，他又背上包，奔波在路上。“活儿没干完，就这么放下不管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张福有说。

获得“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称号的时候，张福有想起了这些年与他同行的人们，特别是吉林省敦化市岗子村，那群跟着他东奔西走的志愿者。有人背后说张福有和这些志愿者，就像“一个大疯子领着一个小疯子”。我想用这个荣誉为我和他们正个名，我们这些年不是在瞎跑。“大疯子”张福有说。

2016年，已经退休3年的张福有自觉“活儿没干完”，继续走着他的考古路。他时常独自一人，买张高铁票，背上行李就出发。这年4月到7月，他6次自费赴敦化做考古调查，

其间意外发现了未见记载的岗子遗址群。张福有将经过撰文发表在《吉林日报》上，没过多久，收到了一封有99位村民签名、按手印的信函。

这封落款为“敦化市官地镇岗子村全体村民”的信中写道，在历史悠久、清代为“通沟镇”的岗子村，人们正在村委会的支持下，挖掘村子的历史文化，发展新型农村文化产业。“我们就是当地的平民百姓，在支离破碎的记忆中寻觅，在古籍和有关资料中查找，生怕搞错了。在看到您的文章后才知道，我们这块地方还有这么厚重的文化史。我们一下子更兴奋了，兴奋之余，我们渐渐地意识到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好的事，梦想着若能请到您这位专家为我们指导、把关……”

张福有决定到岗子村去。“我感觉这些签名沉甸甸的，分量特别重。这是老百姓对我的信任，也是我的责任。长白山一带的历史文化，不能只有咱研究的人知道，还要让老百姓也知道。只有让村民了解村子的历史文化，他们才会更爱护它，才会有文化自信。”

当年起草联名信的于亚茹公司和家庭都在外省，因为一次回乡祭祖，听了祖辈在岗子村的故事，决心回村投钱建文化园，传承古村历史。

在张福有建议下，于亚茹给岗子村的文化园取名“通沟书院”，慢慢聚集起一群热心志愿者。大家一起编撰村史，建乡村博物馆，办民俗文化讲座，开历史文化讲座，跟着张福有早出晚归踏查遗址，寻觅文物……

打那时起，张福有每次来敦化，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同伴，那是因为志愿者们不放心他一个人去田野、山间。有一回，张福有到岗子村附近的通沟岭山城测量古城的周长，因天热中暑，他在城墙上拍完照两眼一黑，晕倒在地，后来被阵

东北大地上的文化行者



▲张福有(右四)与岗子村的志愿者们在雨后的岗子遗址。 本报记者王京雪摄

雨浇醒，腿又抽了筋。

“他就是个倔老头！”于亚茹说，“可他的精神真感动人，他的这种执着劲儿也传到我们这些人身上。说我们疯也好，傻也好，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复兴地方文化，是为了给后人，用张老师的话说，给陌生人留下点东西。”

志愿者芦雅洁说，跟着张福有考古会上瘾：“第一次见到张老师时，他跟我们说说笑笑，可亲近了。我们以前不懂考古，他每回

来都给我们讲故事，我们越听越喜欢，后面又听他讲了那些忧责和担当，更觉得这些事有意义，跟着他有学不完的东西。”

那是敦化一个烈士陵园的管理员，也是东北抗联名将陈翰章的外甥。张福有到岗子踏查古道时，他来当司机。“那条路特别颠簸，我比张老师小将近20岁都受不了。那几天，看着他披星戴月，在路上跪着蹲着找东西……我就只有一种想法，只要他来，只要我

有时间，我就给他开车。”

“有些人就是不理解，觉得你们图啥？给你们钱吗？”志愿者史桂娟退休前是敦化市文体局局长，她把心声写进了《通沟书院志愿者之歌》：“心中燃烧着一把火，肩上担着一份忧责。寒来暑往，顶风冒雪，足迹留给高山大河……”

近6年来，张福有带着这些志愿者跑了上百趟岗子遗址。他们在暴雨、台风后，从地表采集到雨水冲出的石器、陶器，玉璧、五铢钱、青铜车马、铁刀、铁镞等器物上千件，年代跨度约在8000年以上。这些器物，在研究结束后都将被捐给当地文博部门。

张福有判断，岗子遗址，可能是挹娄故地，或与渤海国创始人大大祚荣“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有关。他期待考古工作者们尽早开展调查和发掘，破解这片遗址背后的秘密。

研究了20余年长白山地区的历史文化，张福有心里还有一些谜题有待攻克。觉得自己还跑得动，准备尽量跑下去，毕竟“人生的价值多种多样，能在东北考古调查和文史研究中，解决若干疑难问题，就是我的历史价值和史学价值”。

回头望，他历数那些闪光的、充满快乐和满足的时刻——凌晨三点半，终于搞明白一个学术难题，数着表忍到天亮，立刻打电话与其他学者分享；在书里找到了寻觅数年的答案，赤脚从床上跳下地，边喊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边在屋里绕圈；在暴雨后的岗子村，跟着村民向导走没走过的古道，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遗址点，捡到了珍贵的陶豆；守住一块遗址，发现一个新知，受到学界的认同，得到村民们的尊重，自信为后来人留下了有价值的讯息……

“虽然累，但我心里觉得值得。”张福有说，“忧责始终是个巨大的动能，活儿没干完，未来的路还很长，长长的路，要慢慢地走。”

其实对于张福有，活儿永远也干不完，但就像他的名字，“有”活干，也是“福”。